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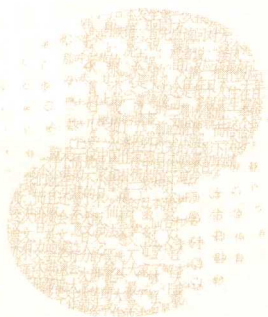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传统与文化研究系列

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

LISHI YU XIANSHI ZHIJIAN

ZHONGGUO JIAOYU CHUANTONG DE LILUN TANSUO

丁钢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传统与文化研究系列

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

丁钢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 / 丁钢主编.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中国教育传统与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5633-8269-9

I. 历… II. 丁… III. 教育—研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578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4.25 字数：240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3 000 册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丁钢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我国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这研究的热潮中,社会科学各界可以说相当的热闹,相比之下,教育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研究还是相对落寞的。

一方面出于时代的感召,另一方面也与自己的学习经历相关,我在大学本科学历学习哲学期间,对佛教思想文化历史认真研习过一段时间,积累过一些资料。而在读文学硕士生学习期间,又认真地研习过道教思想文化历史。故而,在进入教育学博士生期间,在研习儒家思想文化和教育历史的基础上,萌生了进行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教育研究工作的兴趣。

我在 1985 年至 1986 年期间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从先秦教育思想的研究开始的,这实际上后来形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儒道教育思想的比

较研究》。而作为先秦以后的中国教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东汉以来的佛家文化。于是,几乎同时,我的研究开始转向中国佛教教育和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此后在1988年成书的《中国佛教教育和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也形成了我在教育文化方面研究的早期著作。之后,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邀请下,我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学界朋友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从1990年到1996年,一共出版了8种。这项工作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研究”为题,项目不仅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重点,丛书也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八五”出版重点。在此期间,我主要研究并出版了《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1996),与刘琪合著的《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由我主编的《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1990)和《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1996)。

如果说上述的成果均是着眼于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化的研究,在“九五”期间,我转向了对中国教育和文化传统的理论探索。我主持的“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项目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资助项目。通过数年的研究,我主编出版了《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一书(2002)。这一理论探索进而延续到“十五”,并以“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为题的研究项目,被批准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最终形成了《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的成果。

此次诚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情相邀,并感谢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理解和支持,并得到国家“985工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与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子项目的资助,遂得以把由我主编的《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和新作《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加以组合,形成这套《中国教育传统与文化研究系列》。

其中,《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自出版以来,曾印两版。而此书也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八五”出版重点,业已脱销。《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一书出版以来,也广受读者欢迎。《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则是由本系列首次出版。

《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作为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的著作,力求通过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研究,注重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探索中国教育在中国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并着重揭示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教育史分别研究中所难以体现的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在研究中,此书打破了就教育论教育的局限,从中国文化与教育讨论中那些尚未涉及或有待深入而且又十分重要的课题入手,探讨了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一些重要方面的关系。

《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则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内涵重新做了一次梳理。这次重新梳理沿着以下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教育传统的精神内涵、教学机制、表现形式与社会谱系等结构性内容;二是分析中国教育传统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诸多重构事件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这些梳理揭示了如下方面:中国教育(包括道德教育)传统内在的文化精神与生命情怀,中国教育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及其表现,中国教育传统的自然、人文与社会谱系,中国教育文化向社会生活渗透后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教育形式,与国际教育发展相呼应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种种努力,等等。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一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中国是如何在新的全球教育文化频繁接触的历史条件下依据自己的理解来建构教育事业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如何从整体上对这个过程进行价值定性,而在于展

现中国在发展自己的教育时所投入过的智慧与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紧张乃至困苦,正是这些构成了中国教育的“文化性”,而中国教育所能贡献给世界的恰恰就是这些文化性。本研究想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作用与影响从未在现代化以及当前全球化进程中“消失”过。在中国,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同样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作为根基的,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是什么,也不在于理论上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可能具有哪些“现代价值”可以用来抵消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各种文化危害,而在于首先承认,无论是教育理念的更新,还是教育制度的重构,最终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摸索和完成的,而恰恰因为这一点,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仍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之所以出版这套研究系列,还出于一种理论上的思考。

20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常常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而实现的,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所产生的种种交叉学科,既是教育研究视野扩展的标志,又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中成功运用带来的结果。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新的生长点。

而今天,关注文化研究与取向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共同趋向,尤以教育与文化的研究为代表,关心教育活动相关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即从文化发展的视角研究各类教育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以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研究各类教育问题。应该说,从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分析各自所关心的中国教育事件,从而引出相关的政治经济结构思考,如此的话语叙事方能显示出观照教育的理论张力。因为,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绝不是一种所谓外在的联系,其恰恰就是解读中国教育历史和现实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内在研究基础,因为中国教育正是以自己的文化内涵及社会谱系(脉络)参与到眼前这个日益明显的全球化教育趋势中去的,中国

教育历史与现实处境面对全球化趋势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张力,应该成为透视中国教育的前提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教育”的理论视野中,所谓“本土”就是指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探索,无论采取何种现实主义的视角,都须以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内涵作为基础。

此系列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多元研究视角切入,进而深入到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内涵,再进一步为中国教育在全球化视野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众多新颖的理论研究观念和多元文化视角,从而构成一个研究中国教育的探索历程。

我希望,这不仅仅是我与我的同事们的研究和探索历程,也能成为所有关心中国教育发展的读者的共同历程。

序 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现代想象、解释和评论已变得声名狼藉,普遍被看成与“社会现实”问题无关的夸夸其谈(G. E. Marcus, 1986; 利奥塔, 1997)或冷酷僵化的历史机制的话语阴影(Michel Foucault, 1977、1979; 华勒斯坦, 1997)。新近的许多理论选择,无论是形式主义或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无不放弃内容,而仅仅试图在个性化的叙事风格中,在否定一切关于社会理想和人性价值的现代性话语中,求得理论张力的延伸。另一方面,各种严肃但却孤立的现代性视野、主题与内容又一并汇集在“文化”的名义下,重构自己的修辞方式与话语结构,似乎只有这样才不仅可以避免对历史与现实的逃离,而且能够灵活地认识眼前这个被上述理论个性化发展趋势所证明的多元文化既斗争

-
-
-
-
-
-
-
-
-
- 2

-
-
-
-
-
-
-
-
-
- 2

这样一种试图立足于现代社会语境及其未结局来勾勒探索视野的文化研究意识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界表现得非常显眼。但是,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文精神传统的差异,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界的文化研究兴趣并不像西方人文社会学界普遍将现代性理想定格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毋宁说,支撑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动力更多来源于对中国社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焦虑”。很明显,这种焦虑会降低文化研究的自由主义渴望。与此同时,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情关切,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在与西方文化研究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会将注意焦点放在对西方理论框架进行梳理与质疑上,期望能因此勾勒出更贴切的透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工具,何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文化研究所描述的经济社会关系日益渗入中国社会结构,也需要细致检查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框

架。

应该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接触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之际,中国人文社会学界的文化探索难免会情绪性地把西方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直接拿过来,作为分析中国现实的逻辑起点,很方便地从文化价值批判的角度来谈论中国现实。一系列按照“西方/中国”、“现代/传统”的两分理路而展开的话语建构便表明了这一点(汪晖,2000)。于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中,中国现实也常常被处理成了仅仅是“澄清”西方文化特征的“他者”。其内涵不是被理解为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理性机制(Max Weber,1951)或纯粹追随西方文化的被动结构(John King Fairbank,1971),就是被解释为绝对不缺乏西方的理性精神(余英时,2001)。不难看出,就中国现实而言,这些理论探索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均是“伪问题”。然而,在这些关于中国的价值批判话语潮流日渐高涨的时候,西方学者却意识到韦伯或费正清式的中国话语并没有将中国本身的内涵揭示出来,从而发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理论呼吁,希望关于中国的描述能更“细致化”,能更接近中国的“人情”(柯文,1989)。

在“回到中国”后,或者更具体地说,在韦伯、费正清之后,西方中国学界的确创作出了更细致、更符合中国人情的作品,其中引人注目且已被译成汉语的有《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1999)、《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国华北农村,1900—1942》(Prasenjit Duara,1988)、《功过格》(包筠雅,1999),等等。这些著作都做到了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细节入手,由细节引出相关的政治社会结构,因而不仅跳出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框架,还将中国状况及其问题以一种文化叙事的方式流畅地表达了出来。这些话语转换背后隐含着的理论倾向,显然符合柯文所归纳的“哲学”:中国问题不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社会生活中。虽然由这一新视角创作出来的中国话语仍旧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为古典中国伤感的情

无论是作为对柯文的回应,还是出于自主的摸索,“中国经验”或“中国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界同样成了热门探索主题。尽管在局部领域,仍然有人从西方的文化价值出发,巧妙地绕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推出了“人文精神”(王晓明等,1996)、“诗意的栖居”(郇元宝,1995)、“十字架上的真”(刘晓枫,1995)等一些颇具诱惑力的文化批评主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人文精神传统对社会的“焦虑”,这些依附于现代或古典精神的文化批评活动根本无法化解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关切,其理论视线总是被一系列西方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所遮蔽,以至于只能在中国问题外围发表一些总体评价,并依靠美学的抒情方式,转移因为难以理解中国社会而产生的各种困惑。

相比之下,直接以中国经验为探索对象的现实主义文化理论活动则相信无论对于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有多了解,都不能以此代替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了解,或者说,仅仅是把现代性理想所描绘的人类前途当成了实际的历史内涵。在这种理论自觉的推动下,当代人文社会学界的文化探索逐渐形成了两股颇有声势的理论倾向:一是清算 20 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界的主要理论框架,梳理其构成方式及其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勾勒理论视野,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汪晖,1997、2000);另一种理论探索则立足于中国“地方经验”的文化叙事,通过“地方知识”来检讨西方各种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理论言说以及“地方经验”与现代性历史变迁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王铭铭,1997)。与这两种文化探索可以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文化探索一直在试图寻找更细致的理论道路,而 90 年代中期以来,教育学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从“文化”的角度重构教育理论视野。无疑,这与人文社会学界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掀起了声势更为强大的“文化浪潮”有关,当“文化”似乎成了整个学术界的公共话语,教育学也势必会有向“文化”靠拢的理论兴趣。但是,教育学的文化探索在落实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尽管人文社会学界以及教育史领域已遭遇过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化理论抉择,教育学领域的文化探索似乎并没有仔细梳理这一理论抉择背景,反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重复了价值两分的理想主义理路,具体表现则如从“人文精神”、“诗意的栖居”等西方人文理想出发,对教育现实展开批判或提出更完美的教育形式,与之相联系,人、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科技理性、生活世界等则成了分析教育现实的基本文化词语。

很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以上溯到赫尔巴特那里。由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恰恰是以思考这些教育问题为中心:应该将人(儿童)教育成什么样子?如何才能把人(儿童)教育成这个样子?从这一点来看,教育学的理想主义文化重构实际上是将赫尔巴特式的教育模式,即伦理目的、心理学(灌输)方法,改造成了人文目的、解释学(理解)方法。无论怎样,在这一理想主义文化理路勾勒的教育语境中,中国教育现实包括教育历史都被扬

弃了,所以,当人们开始教育学的文化探索而进行理论反思并决定选择现实主义的研究道路时,其反思及批判的切入点恰恰是教育学的理想主义文化重构没有把教育历史与现实当做理论探索的对象,也就是没有将“中国教育”放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考察(周勇,2000c)。有的学者还指出,倘若教育学要想勾勒现实主义的文化探索视野,就必须将自赫尔巴特以来的教育思考习惯“终结”掉(吴刚,1995)。从最近的教育学动向来看,教育学的文化探索实验似乎在向现实主义理路靠拢,有的学者开始从“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的视角来分析文化、社会与教育之间的历史变迁关系及其可能的后果,例如,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遗忘、受制于全球化的知识社会运行机制,等等(石中英,2001)。

与教育学的文化探索在理论抉择时承受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野不同,中国教育史领域的文化探索则由于“天生”就与“事实”纠缠在一起,所以一直在尝试各种知识视角,以求能更细致地描述出中国教育的内涵及其社会文化谱系。为实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教育的文化研究可谓作过诸多努力,包括广泛吸收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经济学的叙事工具,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教育研究展开理论对话,从而勾勒出了一系列旨在从不同细节来展示中国教育内涵的理论视野,例如,中国教育文化的哲学基础(高瑞泉,转引自丁钢,1992a)、理学教育的文化品格(黄书光,1993)、中国古典文艺教育形式(金忠明,1992)、书院教育的文化精神、明清地方经济生活与教育(丁钢,1992a、1996),等等,可谓描述了中国教育的不同细节及其社会文化关联。

最近,这一探索尝试又提出了“中国教育”这一概念,不仅重申了多学科对话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理论意义,而且强调了中国教育当前的现实处境,即全球化趋势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张力,应该成为透视中国教育的前提语

境(丁钢,2001)。显而易见,“中国教育”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构建近二三十年来一直令中国教育学界魂牵梦萦的中国本土教育学体系(这不光是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绝非缺乏本土教育话语,更是因为如果按照赫尔巴特式的思路,中国本土教育学的体系难以确定,谁都可以选择理想与方法,推出自己的教育学话语体系),毋宁说“中国教育”这一概念所要尝试的,乃是综合现代学科的理论策略,并立足于对中国教育当前处境的密切观照,勾勒一种集历史与现实于一体的教育探索视野,也就是使中国教育的历史内涵作为一个基础变量融进分析中国教育现状的理论活动中。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中国教育”的理论视野中,所谓“本土”就是指中国教育现状,而不是指能够建构出与赫尔巴特或杜威的教育学体系齐名的中国教育学,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探索,无论采取何种现实主义的文化视角,都必须以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内涵作为基础。

然而,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内涵绝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尽管此前人们为中国教育的文化探索已作过诸多努力,但是,这些零散的探索不仅没有被统一地纳入“中国教育”这一概念之下,而且其话语叙事也没有显示出观照现实的理论张力,况且就叙事本身而言,这些零星的探索对于中国教育历史内涵的揭示亦显得不够周详深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决定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内涵重新作一次梳理。这次重新梳理将沿着以下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教育传统的精神内涵、教学机制、表现形式与社会谱系等等结构性内容;二是分析中国教育传统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诸多重构事件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这些梳理无疑是想为当代中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个比较清楚的关于教育的文化和社会的思考背景。具体地说,就是促使当代中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反思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结构之基础上展开行动

的,而 20 世纪以来中国诸多现代性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尝试,又是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可能产生的裂痕与差异的。

为实现这一梳理过程,本次探索仍将继续采用多学科视角,包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教育学等。显然,这一在教育学之外增加多重视角的做法绝不是为了显示文化研究的理论品格。实际上,如前所述,许多原先各自独立的现代性主题、视角与内容一并汇集到“文化”的名义下,这一趋势所表明的恰恰是当代人文社会理论活动早已超越了原先在单一的学科视角和修辞风格下进行探索的求知、写作模式,现在人们需要知道更多的“事件”,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Michel Foucault, 1983; R. P. Mourad, 1997; 古德森、沃克,转引自丁钢,2001)。本次探索借助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视角与叙事策略,也是为了从中国教育传统中挖掘出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体系。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工具,本次探索将揭示如下方面的问题:中国教育(包括道德教育)传统内在的文化精神与生命情怀,中国教育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及其表现,中国教育传统的自然、人文与社会谱系,中国教育文化向社会生活渗透后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教育形式,与国际教育发展相呼应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种种努力,等等。

显而易见,由这些方面呈现出来的中国教育传统的人文塑造机制及其历史社会关系,可以为分析中国教育传统在 20 世纪以来发生的诸多现代性的重构事件(包括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供丰富的理论反思资源。反过来说,分析中国 20 世纪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构经验,也能更进一步提示中国教育传统在现代的命运:现代中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怎样处理教育传统的?是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教育传统的?注意到了教育传统的哪些方面?而其理解或关注的角度又是来源于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对于这些